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胡玉萍 ◎ 著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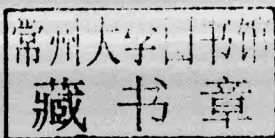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 研究成果
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胡玉萍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胡玉萍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1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3710 - 7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教育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G75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0730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千 日

封面设计: 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14 千字

印 张: 7.625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710 - 7/G · 1934(汉 93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

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

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贡献。

滕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前 言

早在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期间，笔者就有幸接触和翻译了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这些资料也培养了笔者对美国少数族裔教育问题的最初兴趣。虽然后来由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笔者的研究领域一再变换，但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始终不曾割舍。直到 2007 年，笔者以“美国当代少数民族教育理论、政策与启示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有幸被列为教育学国家青年基金项目，才使得本研究得以继续。本书稿就是在此项目最终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我国学界对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和介绍上，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对中美多元文化教育差异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这些对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相关介绍和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了某些借鉴。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美国各项具体民族教育政策。尽管由于美国少数族裔教育问题带有浓厚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色彩，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努力也未能改变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深层原因，因而未能获得期望的效果，但是这些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发展少数族裔教育所做的尝试和努力，其视野更加深入，也更加广阔。对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的理论与政策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并从中获取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有益的启示是非常有

必要的。鉴于此，本项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理论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理论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热点和争论，但学校改革运动中主要体现为主体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博弈，其理论发展基本上是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主要体现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少数族群的街头抗争，发展为系统的、制度化的教育理论。目前，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已成为美国公共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并成为深刻影响世界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

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不仅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也是与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社会思潮的博弈过程，倡导文化多元的文化相对论和教育公平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核心价值；美国教育领域关于少数族裔学业成就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分析研究的结论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追求差异到差异平等，再到文化之间的相互承认的过程。20 世纪 50—60 年代，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从消除种族歧视、为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角度来说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多元文化教育的含义扩展到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不再仅限于消除种族歧视上。20 世纪 90 年代多元文化教育进入反思和深化阶段，也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教育转向了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

2. 政策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政策主要是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美国少数族裔教育优惠政策主要是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美国公立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是在中小学实施种族合校政策，美国少数族裔教育课程改革主要是实施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政策。上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做法和宝贵的经验，也面临了不少讨论和争议，其中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已经可以评价。

(1) 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放任期（18—20 世纪初）、限制期（20 世纪初—50 年代）、机会期（20 世纪 60—70 年代）和否定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四个历史时期。从本质上看，将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融入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语言文化是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以英语为中心的语言统一性而服务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大熔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和消除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不利群体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启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补偿性的行政命令和立法措施，给予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不利群体以某些优待和照顾，从而促进了少数族裔、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 高，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族裔高等教育的发展。

(3) 美国的种族合校政策主要是针对美国原有的白人和黑人学生种族隔离教育制度，采取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混合就读在一个学校的方式，以促进黑人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种族合校也称为“种族并校”或“学校种族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实施种族合校的政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其未来发展走向值得人们关注。

(4) 美国中小学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政策主要包括多元文化课程设置、多元文化教科书开发和多元文化教师教育三部分。从整体上看，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尚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和课程开发进入制度化阶段，成为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政策的实施，在推动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创造有利于少数族裔学生发展的学校环境、培养合格的多元文化教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作为美国早期奴隶贸易产物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

和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族群意义。美国黑人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同主流文化之间的交流史和斗争史，而美国政府对于黑人这一特定族群的教育政策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历史进程。而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同样具有特殊性，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印第安人作为部落成员、联邦政府的“被监护者”和美国公民，这样一种复杂的身份通常意味着在政策制定上的困难，在印第安人教育问题上也反映了族群的这种特殊性。

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理论和政策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但总的看来，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理论和政策是基于美国特殊的社会人口构成、族群关系、文化特点形成的，其社会背景、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都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有着重大差异，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例。首先，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与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对象不完全相同。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对象涵盖了族群、阶级、性别、宗教、文化等弱势群体，范围不仅仅是少数族裔教育问题。其次，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与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社会背景不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处理不同的族群关系和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冲突，种族歧视、文化偏见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最初的目的就是改变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利地位。虽然我国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还存在发展性差距，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共存”的共识，在教育上更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按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为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教育。再次，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与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目标不同。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有着很强烈的政治诉求，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追求各少数族群政治、经济权利的平等，而不仅仅是对不同文化价值的承认和尊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非洲裔美

国人争取自由的民权运动，因此争取不同少数群体的权利和权益，确保不同种族和所有其他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平等价值，一直是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标。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更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致力于以教育为突破口和基本途径，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显然，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美国特定的族群文化和族群等级关系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政策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是偏颇的，因此不能照搬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政策来解决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当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不存在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但无论是民族、宗教、语言，还是地域、阶层之间，也都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多元现象。面对各种文化多元的现实，美国这一类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尤其是他们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探讨层次的深度，对社会文化思想给教育发展影响的检讨方式都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借鉴，笔者非常同意前辈学者的观点，不应该陷入对一些具体的课程模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简单模仿上，而应该从更普遍的意义研究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承认与尊重，以及如何在教育中体现和传达这种认识。此外，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面临的文化差异与国家整合的冲突与协调等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结合这些问题进行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日益完善和进步。

本书既是关于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之作，同时也可作为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等相关学科，以及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教材或教学参考读物，同时也可以为相关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研究和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尽管在本研究中力图对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的理论和政策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呈现，但一些不足仍然在所难免。比如限于资料获得